

Prince Kung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Ching Rule

恭亲王奕訢传

Prince Kung in The Eyes of Foreigners

外国人眼中的恭亲王

[美] 托尼·邓 / 著

王纪卿 / 译

他曾是父亲道光皇帝眼中
最有才学的儿子，最终却与皇位擦肩而过；
他曾是西方人眼中的最有能力
复兴大清王朝的不二人选，最终却成了为世所憎的“卖国贼”；
他曾是近代中国史上最有可能
改写中国历史的改革家，
最终却沦为晚清政治权力场上失意的弃儿。

为什么这位近代中国历史上众望所归的晚清王爷，总也无法挣脱

**一步错、步步错
的人生失意怪圈？**

是什么造就了他有心济国、
无力回天的仕途悲剧？

看《恭亲王奕訢传》，切身体悟丰富而

**亘古不变的
人生至理！**

恭亲王奕訢传

PRINCE KUNG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CH'ING RULE, 1858-1898

【美】托尼·邓 著 王纪卿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恭亲王奕訢传 / (美) 邓 (Teng, T.) 著; 王纪卿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438-8916-3

I. ①恭… II. ①邓… ②王… III. ①奕訢 (1832~1898) —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6257号

恭亲王奕訢传

著 者 (美) 托尼·邓

译 者 王纪卿

出版人 谢清风

策划人 周 政

策划编辑 龙昌黄 杨诗文

责任编辑 龙昌黄

封面设计 罗四夕

版式设计 吴繁荣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916-3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鸣谢

我想对欧仁·波德曼（Eugene Boardman）教授致以最深切的谢忱，为了他对我在威斯康辛大学学业的指导，为了他自这篇论文写作之始一直阅读和批改手稿的那份坚忍不拔的执著。

我还大大受益于周策纵（Chow Tse-tsung）与毛里斯·麦思乐（Maurice Meisner）两位教授，因为他们不知疲倦地复审手稿，并对之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具有洞察力的评论。

我想感谢阿蒙德·帕楚科博士（Dr. Armond Patrucco）与玛丽·帕楚科小姐（Miss Marie Patrucco），为了他们阅读手稿并就其文风提出专业意见的善意与耐心。

我要把最后但不是最小的谢意献给我的妻子格蕾丝（Grace），她分担了我的许多工作，并成为我日益不可缺少的批评者、打字员和爱侣。没有她，没有她不断的鼓励，这项研究是无法完成的。

出版前言

中外交流由来已久，自传说中秦时徐福东渡扶桑，至汉唐东西方交往日炙，再至近代以来中国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之中与世界融为一体。伴随这种交往与融合，中国逐渐为世界所了解和接受。迨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之一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因制度、文化、地域等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中西方之间的误解和歧见，并未因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贸易的紧密联系而消弭，反倒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制度和文化的壁垒。

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对话，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并接受中国，除了我们主动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之外，同样也需要我们去了解世界。如何了解世界，或许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体认世界其他国家看待中国及中国人的惯常思维及评价方式。

“思享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系列丛书即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旨在通过译介外国人著述的有关中国的人物、事件、制度、文化等方面的传记及其他类型图书，让国人从中体悟他们看待中国的独特思维、独特视角，以此来反思和确认中国在全球文化视野下的真实影像，

找准世界眼光中的中国，从而更好地与世界融合，与其他民族和谐并峙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系列丛书所选译的均是海外有影响的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畅销书作家或曾见证中国历史变迁的亲历者，译者亦多为该领域的研究专家，并且所有译文都经编辑人员据原文认真核定，以便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但由于我们编辑人员的学识水平有限，其中难免错讹之处，敬希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有机会重印再版时更正。

湖南人民出版社

目次

001/第一章 早年：失意的皇位争夺者

014/第二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国救星

058/第三章 辛酉年的权力诱惑

093/第四章 恭亲王的政治雄心

141/第五章 权力场上的低能儿

193/第六章 评价：有心强国无力回天的大清王爷

206/参考文献

第一章

早年：失意的皇位争夺者

19世纪下半叶的清朝，是一个飞速剧变的时期。发展得迟缓而持重的中国文化，与生气勃勃的西方相碰撞，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变故与争议空前之多的时代。求稳的理想面对着进步的理念。西方的强权、观念与炮舰，在中国人当中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响，中国人力求寻找办法，希望既能捍卫中国的传统，又能有效地与西方入侵者竞争。每一种反应都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需要另一个反应，这一进程愈演愈烈，终将导致传统中国社会的崩溃。鸦片战争与附庸国体制的解体，削弱了清朝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控制力。这种衰弱导致了19世纪中叶的巨大叛乱^①，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它使企图复兴清

^① 此处所指叛乱即太平天国运动。（注：文中注释若无特殊说明，则均为编者所加。）

朝统治的自强运动仓促提前。自强运动的改革激起了保守派与“改良派”之间的斗争，接着导致政府的堕落与腐败。这种衰弱鼓励了西方的进一步入侵，中国人以1898年的激进改革回应这个挑战。这些激进变法的努力，导致了一次强烈敌意的反应——义和团运动。这种混乱的选择和灾难性的结果历时半个世纪，逐渐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了变革的必要性。许多中国人现在勇敢地前进，因为他们指望通过清朝统治的中兴来使中国变得强大，免遭外国的威胁。

勇敢前进的第一个重要领导人是清朝皇室的王子奕訢，或称恭亲王，他在1860年下半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那几个关键而危险的月份里，亲自在京城内与那些“外夷”进行谈判，然后便意识到了采取新步骤的必要性。他从这段“宝贵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在1860年的和局敲定之后，恭亲王立刻以他的一些作为令政治上自觉的中国人感到了兴奋，这些作为是：辛酉政变，总理衙门（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外交部）和同文馆（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学校）的设立，与西方人进行合作，以及支持由南方的汉人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领导的自强运动。所有这些大胆而具有变革性的计划，对处于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幸的是，恭亲王的先进程度与手中所握的权力，都不足以使他贯彻他的意图。他无法应对政府中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在精明强干、野心勃勃甚至贪得无厌的慈禧皇太后执政的时候。在1858年之后的将近四十年的斗争中，恭亲王失败了，去世了，死得沮丧而悲惨。

恭亲王的一生反映了中国晚清统治的进程。他的成败，就是清



恭忠亲王爱新觉罗·奕訢青年像（1833—1898年）晚清时期声名最显赫的皇家宗室王子。道光帝第六子，一度与皇位擦肩而过。他曾经站在中国政治历史舞台的顶峰，号称是西方人眼中最有权势的中国王子，他力主洋务，奖掖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南方汉人洋务领袖，一度带领清王朝走向复苏和中兴；他创设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机关——总理衙门，开设了为中国现代教育奠定第一块基石的同文馆……但他同时也是政敌眼中的“鬼子六”、“胆小鬼”。

朝在19世纪后半叶的成败。他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也是清朝为了生存与中兴而进行的斗争。鉴于他的重要性，恭亲王的一生（理应）值得密切地关注。本书的研究试图将这种关注聚焦于恭亲王在19世纪中国所起的作用。

惜败的皇位争夺

恭亲王本名奕訢，出生于1833年1月11日，为道光皇帝第六子。他有八个兄弟和十个姐妹^[1]，其中只有寿安公主和他自己是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所出。他的母亲是道光皇帝的一名贵妃（级别为一等）。孝静成皇后被描述为一个“天性善良”的女子，在皇四子奕訢的亲生母亲孝全成皇后死于1840年之后，她得到了当时仅九岁的奕訢的抚养权。奕訢和奕訢是一起长大的，彼此之间比其他的兄弟姐妹更为亲密。^[2]《清史列传》中的《奕訢传》有下面的一段话，描述了他孩提时代的性格：“奕訢为兄弟中最聪慧者，自幼明敏能干过人。六七岁时即能背诵《千字文》。奕訢尤为其父道光皇帝所宠，甚得兄弟喜爱，皇嗣奕訢亦不例外。”^[3]^①从六岁开始，奕訢便开始接受与其兄奕訢同样的教育。显然，道光皇帝当时尚未选出皇位继承人，但他无疑会在奕訢与奕訢两人中挑选其一。道光将两个孩子都教育为可能的未来统治者，他可以由此而拖延做出决定的时间。^[4]于是，他将两位声望最高的学者任命为皇家教师，教导奕訢与奕訢。皇嗣奕訢

^①《清史列传》中未见奕訢传，故此段文字原出处无从查找，此处为译者所译。——译注

师从杜受田，此人是山东人，进士出身；奕訢则师从卓秉恬，此人为四川人，也是进士出身。在他们指导下，奕訢与奕訢每天学习中国经典、历史、哲学与纯文学的注解，以为他们成为有德行的统治者^[5]和有效率的首席执行官打下基础。另有两名皇家教师给他们教授满文和蒙古文，这两种文字被视为官方语言，尽管所有的满人官员一般都使用汉语。由于奕訢与奕訢还要掌握有关战争的知识，皇帝还指派专家来教授他们相关的科目，即箭术、骑术与火器。所谓火器，是指使用各种火药的武器装备，包括个人武器、野战炮和炸药。^[6]

这个计划是要将学子塑造为忠诚而驯良的王子，塑造为有德行的统治者，塑造为中国经典、历史、哲学和纯文学的终身学生，塑造为一名坚强而高效的总管，一位强大的总司令。换言之，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培养出一个集儒家君子式的统治者、哲学家君主和“西点”^①毕业生为一体的人物。的确，奕訢的性格确实反映出了他的教育大纲所反复灌输的许多可贵的品质：忠诚、明快而能干。不过，这样的教育尽管有许多优点，却仍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奕訢是一名具有强烈个性的保守派。他可能是、并且常常是顽固、自大而喜怒无常的。

道光给奕訢的特殊待遇对他的整个一生都有极大的影响，塑造了他的人格与心理，赋予他在清廷中的特殊地位，于是导致了他后来与其兄奕訢之间的危险关系。

十八岁之前，奕訢在宫内过着平淡无奇的日子，关于他的存在，

① 即蜚声国际的美国西点军校。



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1782—1850年）原名绵宁，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位皇帝（1820—1850年在位）。在立储一事上，道光皇帝一直很犹豫。从他同时将皇四子奕訢（健在的皇嫡子）和皇六子奕訢视为皇位继承人来培养这一点来看，作为父亲，他无疑格外钟爱皇六子奕訢。尽管道光皇帝未将皇位传给奕訢，却在传位密诏中封他为一等王爵恭忠亲王。而这，也造就了此后恭亲王奕訢跌宕起伏的一生。

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信息都不多见。记载表明，在1848年，十六岁的奕訢娶了桂良的第十个女儿。记载中还对道光皇帝挑选皇位继承人的标准做了有趣的记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说出了道光皇帝在1850年去世之前为什么没有选择奕訢而是选了奕訢作为其皇位继承人的原因，萧一山的《清代通史》^[7]持同样的说法。这些记载说，当道光皇帝老病交加时，他仍然没有公开他选定的继承人，奕訢与奕訢都为他的选择而担忧。他们开始讨好父皇，不断地秘密地咨询各自的皇家教师。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加剧了奕訢与奕訢之间长久存在的尖锐敌意。有一天，道光突然将所有的儿子召进宫内，宣布第二天要去南苑御驾巡狩，要求他们做好准备。奕訢与奕訢直接去找各自的皇家教师听取忠告。奕訢的师傅杜受田对他说：“圣上这次一定是要考验你们，我劝你明天不要射杀任何动物。如果圣上问你为何不杀，你只须回答：‘春天乃万物生长的季节，我不想毁掉新的生命，扰乱自然的和谐；因此我不杀生。’”

与此相对照的是，奕訢的师傅卓秉恬叫他积极地狩猎。第二天，奕訢和奕訢都照各自师傅的劝告去做了。当天的狩猎结束后，道光皇帝将他们召进宫内。在听取了奕訢解释不杀生的理由之后，道光说：“奕訢懂得一个有道君主应有的胸怀。”

接下来有一次，道光病重时，将奕訢和奕訢召到床边。皇帝再一次测试两个儿子，问他们当了皇帝将会怎么做。奕訢不由自主地就他将要采取的政策讲了一番漂亮话。轮到奕訢作答时，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匍匐在父皇床边的地上哭泣。道光叹道：“朕的第六子聪明，而朕的第四子孝顺。对于君主而言，孝道比聪明更重要。”于是，奕訢

最终被指定为道光的皇位继承人。

以上的段子也许是不真实的，但有过硬的证据揭示一些真相。

《宣宗（道光）实录》中说，道光皇帝在去世之前，一直将奕訢与奕訢两个儿子的名字放在选定皇位继承人的金御匣内。在清朝的全部历史中，金匣内只允许放一个名字，即新皇的名字。显然，道光皇帝在确定皇位继承人时遇到了困难。何况，尽管道光指定奕訢为自己的继承人，但他也赐给了奕訢特殊的头衔和特殊的地位，让他可以协助其兄运作政府，因为道光承认奕訢有较高的才识。在藏有皇位继承人名字的金御匣内，奕訢被封为一等王子，其头衔为恭亲王（恭忠亲王，俗称恭王）。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有关奕訢的师傅杜受田的那个故事是很重要的。在奕訢登基之后，杜受田立刻担任了军机大臣，同时出任工部尚书。当杜受田在1852年去世时，皇帝赐给他汉人官员能够得到的最高身后之名。“文正”之谥，是他因教育和协助奕訢时所发挥的作用而得到的丰厚报答。

道光在1850年去世，于是，遵照他的遗嘱，奕訢正式登上了皇位，并于1851年成为清朝的咸丰皇帝，而咸丰其他的兄弟们，按照道光爷的遗嘱，被封为二等王子即郡王；其弟奕訢成为最高级别的王子，即恭亲王。^[9]也是由于道光皇帝的遗嘱，在1852年4月，恭亲王有了他自己独立的王府；^[10]此后不久，他相继担任了一些重要职位：在1853年太平天国分遣队北上威胁北京时，他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参与京城巡防事宜，然后奉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1854年任领班军机大臣、八旗都统与皇族宗正。^[11]恭亲王似乎不负其父所望，成了一名坚强的摄政者。但是，他与咸丰皇帝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剑拔



杜受田（1788—1852年），清山东滨州人，出身官宦诗书世家，咸丰皇帝的老师。传闻咸丰皇帝之所以能继承大统，与杜受田的面授机宜有很大关系。咸丰皇帝登基后，杜受田备受隆宠，官至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病卒后谥“文正”（清朝谥号的最高待遇，有清一代，谥“文正”者仅八人）。

弩张。无疑，咸丰总是妒忌恭亲王的才干，以及道光对他的喜爱。不过，只要道光的遗嘱仍未从大家的记忆中褪去，只要孝静成皇太后还活着，咸丰没有多少办法动摇恭亲王在宫廷中的地位。但是，咸丰皇帝肯定迟早会找到办法来削弱恭亲王在宫廷中的势力。

机会很快到来了。孝静成皇太后在1855年8月突然去世，咸丰任命恭亲王负责安排皇太后的丧礼。咸丰抓住这个时机，严厉谴责恭亲王在料理皇太后丧事和遵守丧礼方面的所谓过失。1855年9月2日，他革去恭亲王在政府中的所有官职，令他回到上书房读书。^[12]

与此同时，清政府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内忧外患。在国内，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军；在国外，西方列强加紧活动，要求在华南开埠，因为他们不满于鸦片战争后于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的执行状况。在此危急关头，咸丰皇帝急需恭亲王明智的忠告和服务，显然在重新考虑如何对待他的这位弟弟。毕竟，恭亲王从来没有威胁要篡夺咸丰的皇位，咸丰也不能不顾及他们曾一起长大的事实。咸丰承认他没有明确的理由怀疑恭亲王对皇帝的忠诚与服从。1857年6月，他重新起用恭亲王为大内侍卫的都统，他说出来的理由是：恭亲王在上书房操行优异。^[13]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咸丰皇帝需要依赖恭亲王之处增多了，尤其是在1858年至1860年，清军先后在华南与华北败于英法联军之手以后。^[14]恭亲王在此时占有的优势，不仅由于他作为皇帝之弟的地位，还由于他作为死硬保守派的良好声望。例如，1858年的下半年，在恭亲王的岳父桂良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之后，恭亲王给咸丰上了一道密疏，其中指出：“窃臣闻逆夷要求各款，多出情理之